

他山之石



——论宇文所安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

史冬冬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他山之石



——论宇文所安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

史冬冬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山之石:论宇文所安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史冬冬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10. 9

ISBN 978—7—80752—670—4

I. ①他… II. ①史…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 I 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2477 号

他山之石

——论宇文所安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

史冬冬 著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 bsbook. 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028)84122206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5
字 数	36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670—4
定 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王晓路

中国文化的发展犹如其他区域文化一样，均有一个从自我生长到与他者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范围和影响随着中国从被动到主动进入国际社会而日益扩大。其间，中国的人文学术史的发展亦有着类似的历史轨迹。在中国现代进程中，人文学术进程亦有一个现代进程方式。实际上，中国人文学术从 20 世纪起就在一种与西方人文学术的关系框架中运行。体用之辩、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学科分类复制、乃至人文学术理论的话语形态，都是这一进程中的不同文化事件而已。可以说，从近代开始，中国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原创性知识体系在其近代化进程和现代性探索过程中发生了裂变，对原有思想资源的大力挖掘和重新认识、对西学思想资源的大力翻译和研究，带来了一种学术思想重组的倾向和知识学结构的变化。在这种知识领域的变动中，文学依然是不同区域精神探索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中西方皆以中国文学为对象展开的研究与对话极具学术代表性和启示意义。美国耶鲁大学中

国文学教授苏源熙（Haun Saussy）曾指出：“其实研究不同文化的动机之一，便是探究我们尚未自觉到的态度与倾向，包括自己的偏见。”^①换言之，以西方汉学及其研究为代表的这种互为文化语境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学界提供新的角度、材料、理论支撑点和方法论，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对比性研究，看到处于不同文化语境的学者在面对一些共同问题时所拥有的学术眼光和洞察力，并提供一个具体的对话平台。因而，对现代西方汉学或中国文学的再研究，其学理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研究具体到操作方式，一是可以用中国文学中的若干中心命题为主线，将此命题纳入西方汉学界的学术成果中展开；二是从汉学界一些代表人物入手，对其研究成果进行特定或综合再研究，以期带出对中国文学思想脉络的不同观照和思考方式。二者各有优劣。第二种研究方式可以增加考察的角度，相对充分地体现所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材料的把握和方法论的新意。因为研究总是非常具体的，每一位学者的关注点和研究思路又不尽相同，系统地对个别学者进行相关研究，则可以见出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本书即是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在当代西方汉学界众多的优秀学者中，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即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以早期的唐诗研究奠定了他在西方汉学界的重要地位，此后又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与

^① 苏源熙：《主观与客观、西方与中国之定名和虚位》，载《中国学术》，2001年4期，商务印书馆，第337页。

文论，在治学对象上体现出对具象深入与整体把握的兼顾。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宇文所安在研究方法与思想上逐渐成熟。他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发掘古代文学蕴含的人情世故及其背后的宇宙人生的美学意义；在对文论文本的注解分析中，追述文学思想的源流正变，同时引入西方文学思想传统作比较研究，从意义解读中提取最基本的文学与人生命题。通过这种文学与文论的互文式研究，宇文氏从文本积累与思想通变两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作出了语境化与跨文化的阐释与建构。

史冬冬的这部论著即是从宇文所安对文学史的重构、文论命题的分解和文学选集的编辑三个方面，探讨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再现和阐释。

宇文所安的《初唐诗》、《盛唐诗》等唐诗论著对初盛唐诗歌的发展作了历史性的梳理，实际上是对唐诗史的重新表述，其中包含着重写文学史的种种方式和策略。作者在研究中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在唐诗史的叙述结构上，宇文所安从总体上采纳了传统的四唐论分期模式，然而在《初唐诗》与《盛唐诗》的内部叙述中又提出各自的结构性因素——宫廷诗与京城诗传统。他以两个带有地域诗学性质的诗歌现象分别对初唐诗与盛唐诗做横向的分析，而后又通过《初唐诗》和《盛唐诗》对两者之间的过渡演化做出纵向的整合，这对于唐诗史而言是一种新的可视维度和叙述结构。其二，在文本叙述的情节编织上，宇文所安采取了多种手段来重新定位唐诗发展中的众多诗人及其诗歌特点，主要包括以语境化的视角历史性地还原某些诗人的意义、“消解大家”的叙述策略、将诗人安置在某种写作传统与惯例中进行论述与比

较以及宇文氏的整体文学观。其三，在历史叙述的话语形式上，宇文所安首先体现出强烈的文本中心意识，他采用了一种“以诗带史”的方式，不过多涉及唐代历史的社会内容，而重点关注具体诗人的诗歌创作，在大量的诗歌细读中归结该诗人的文体特征与个性化实践。这种文本意识还体现在论者对文本历史性的尊重，即对现存文学文本形态的确认与质疑上。其次，宇文氏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想象力，基于历史上已知确定性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历史知识，根据历史逻辑对现有文学史中习以为常的历史陈述进行重估，在质疑中进行文学史情节的重新书写。他这种以历史主义为中心的话语模式体现了对历史遗留态的尊重与史家精神主观态的有效结合。

宇文所安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和《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两部著作专注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研究，论及文论的诸多方面和理论命题，在同类汉学研究中显示出较深厚的阐释深度。本书的第二部分集中对此进行了讨论。首先，针对中国文论术语意涵上的模糊性特征，宇文氏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文学语境，从术语意义的历史积淀性、在横向维度上的互联与互融两个层面进行理解，指出中国传统的文学术语讲求的是在文本中的共鸣与回响，深刻揭示出中国文论术语在自身文学传统中的生成形态、担负的指涉功能以及与西方术语背后不同的文化语法和倾向。其次，宇文所安在对中国文学批评的非体系性特征持理解态度的同时，又从文本细读中总结出中国古代文论的三种话语表述方式，即围绕某一论点集中展开的命题式论述、修辞性分析与线性论说方式，从而透露出宇文所安在研究中难以避免西方传统

重理性逻辑的思维特征。第三，宇文氏提出了中国文学思想中非虚构的传统特征，认为一首诗歌的叙述通常被认为是对现实世界中彼时彼地客观真实的记录与再现，经验世界通过诗歌叙述得以显现，这一命题包含了诗歌本体论的认识与假定，直接影响对诗歌的阅读与阐释，并涉及诗歌与作者、读者之间的独特关系，由此引出中西方文学传统在阅读法则与模式上的不同。

宇文所安的巨制《诺顿中国文学选集》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一次整体性的表征与再现。本书的第三部分即是对此选集的多角度解读。与此前同类型的选本相比，这部选集在篇幅规模、文本选择、体例编排、内容题解等方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它通过独特的栏目设置来加强传统内部文本与思想跨时空的回响与继承。透过文本的选择与注释，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演变传统的理解在突显诗歌这一基础文类的同时，从整体上呈现出时代性与文类化的倾向。并且，该选集还从收录作品的多少、作家出现的频率、女性作家的数量等方面，强化和修正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构成。以此种种方式，宇文所安力图构筑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景观与文学经典。

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论进行的文本解读与思想阐释，实际上是在以一位西方读者的身份背景，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进行重新表征与建构，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在这一工程中，宇文氏在强调中国文学传统连贯性的同时，更深刻把握了中国文学传统某种丰富与变异的特质，倡导多元化的古代文学传统，以此来保持传统内在的生命活力。在进行传统阐释的过程中，他的研究始终在感性体验与理性分析两者的兼容中进行。这

与以往侧重一方的情形相比，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和话语方向。与此同时，宇文所安的汉学研究是学术全球化时代一种汉学家权力的表征形式，他是以自己的研究实践来捍卫其合法的汉学家身份与权力。

最后要提及的是，在汉学这一特殊的学术平台与研究领域内，宇文所安既是西方式的，同时又非常中国化。这两者在宇文所安身上始终处于某种张力与对抗当中。就前者而言，我们不妨把宇文所安的汉学研究看作他作为一位外来者意欲对中国文学的某种建构；而从后者的角度看，则意味着中国传统对宇文所安的反影响与反征服。当代汉学正是在这样的二元对立与互动中走向深入。

这部书的思路和框架比较明确，这也得益于作者读研究生之时对西方汉学领域的长期专注。多年以前，系上就有老师推荐史冬冬，他当时是在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基地班，且四年来一直非常优秀。就读我的硕士生之后，果然勤力，也善于思考，同时努力提升自己的英文水平。记得硕士论文选题时，正值宇文所安的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中文译本《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出版不久，因这本英文书是我在美国任教时曾经使用过的教材，所以我建议他研究宇文所安，他随后比较系统地进行了研读，由此完成了硕士论文的写作，并开始关注西方汉学的相关领域。他硕士毕业后继续读我的博士生，并将西方汉学作为读博阶段的重点研究对象。此时，他将视野拓展到宇文所安有关古代文学与文论的宽阔视野，力图对这位汉学家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同时也进行中国文论不同语境的相关问题研究。冬冬自

1998 年进入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至博士毕业之际已满十年。十年当中冷暖自知，既学习读书，又学习为人。在读期间，他还参加我的一些译事，其认真的态度和贴近原文的表述也令人激赏。他为人低调，实干慎言，做事的态度和勤勉的精神在许多学生中是仅见的。因此他在读研期间做人做事皆有所得，被学院公认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作为导师，我也是深感欣慰的。毕业后，他去了厦门大学，相信他在那里会依然保持和提升勤力精神、理性态度和稳健的风格。其实，做学问的过程就是人格修炼的过程。学问有大小，人格有高低。而后者在当代功利为先、浮躁量化的人文环境和学术环境中更为重要，也更难能可贵。人品会保证对学术的敬畏，虚静会保持洞见的深邃。学术犹如无边的海洋，你不能拥抱，但可以使你拥有一种心境和胸怀；你不能只图回报，因为大海已经用纯净的海风滋养了你，而且也可以在海边拾到一些美丽的贝壳。正如著名的《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中开篇所引的欧里庇得斯的那段名言——“He sat in the meadow and plucked with glad heart the spoil of the flowers, gathering them one by one.”^①（他坐在草丛中愉快地摘取着花朵，把它们一朵一朵地汇集在一起。）

现在，冬冬的这部书即将出版并请我作序，因繁杂之事总是

^① Francis Turner Palgrave, selected and arranged. *The Golden Treasury of the Best Songs and Lyrical Poem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With additional Poems to the Present Day.* Annotated Edition. London, Edinburgh, Glasgow, New York, Toronto, Melbourne, and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p. IV.

不断，加之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只能在此序中稍作介绍。国内的汉学研究领域尚未对宇文所安作过系统的研究，这部书在这一具体而微的论域中做一尝试，自有其价值所在。对其本人而言，这既是冬冬学术之路上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今后治学的新起点。

是为序。

2010年7月

导论 宇文所安与中国古典文学^①

自从 16 世纪大批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入华，在掀起一股传教热的同时，实际上也开始了“中学西传”的文化之旅。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研究逐渐由一种本土研究扩展为一种全球性的学术形态，亦即所谓的“汉学”(sinology)。从早期的传统汉学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现代汉学阶段，汉学在几百年的历史演变中不仅名家辈出、成果丰硕，而且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发展与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至今日，海外汉学中的中国文学研究由于持续性的发展已形成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当代的欧美汉学界在继承以往汉学成果与方法传统的基础上，将研究的范围广度和主题深度继续向前推进，同时出现了一批在该领域内颇有建树和影响的汉学学者。本书即是以其中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研究他与中国古典文学

① 全文中所有外国人名、作品名在首次出现时均附原文。引用的外文文献除标明中文版本外，均由作者自己翻译。

之间的学术对话。

一、选题意义与学术价值

宇文所安，英译又名斯蒂芬·欧文^①，美国汉学家。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先是执教耶鲁大学，后转至哈佛大学，现为该校东亚系詹姆斯·布赖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James Bryant Conant University Professor）和比较文学系主任。

宇文所安的汉学研究主要涉及中国古典诗歌与文论两大领域。其早期论著《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1977）与《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1980），使他成为美国汉学尤其是唐诗研究领域第三代学人中的佼佼者。在此后的著作中，《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986）对中国古典诗文的印象式批评，《迷楼》（*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1989）在中西文化传统之间的穿梭，《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1992）、《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年》（*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1996）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论的宏观把握，显示出宇文所安之研究在中国古典文学结构与层面中的日益拓展和深入。总体而论，宇文氏的汉学研究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之下，注重对中国文学思想这一宏大体制与历史传统的突显与体

^① 本文一律采用宇文所安的中文姓名，但在引用具体的文献时，照录中文或译文文献原文中的处理方式。

认，基于此而在具体的对象研究中作一种语境还原式的理解阐释，并在这种历史阐释中不时地追溯中西文学特质不同的思想发源与演变过程。此外，其论著不断变换的研究模式和理论视角使他的研究总是充满了新意，加之学术话语与散文语言相结合的书写风格，使人感受到一位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浓厚兴趣和独特见解，立论之新颖几可自成一家。

宇文所安以唐诗研究开始其治汉学的道路。他的博士论文《孟郊和韩愈的诗歌》（*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u*, 1972）将孟、韩两位诗人放在复古运动的背景之下，选取两人的诗歌进行广泛的比较分析。美国密执安州州立大学李珍华教授指出，该论文“不但阐明了孟郊与韩愈两人的诗歌成就，同时还对‘四唐论’的中唐诗风提出了新颖的看法，把‘复古’运动和诗歌发展的关系及其意义说得很精辟”^①。此论文于197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此后的大学执教期间，宇文氏又先后完成了关于唐代诗歌的另外两部专著《初唐诗》和《盛唐诗》，逐渐奠定了其在欧美汉学界中国诗学专家的地位。《初唐诗》将易受忽视的初唐诗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更加广泛与系统的研究，并且对初唐“宫廷诗”的风格及其与盛唐诗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欧氏适当地采用了一些西洋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术语”^②，其中不乏精

^① 李珍华《美国学者与唐诗研究》，见《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0页。

^② 李珍华《美国学者与唐诗研究》，见《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前引书，第400页。

辟的见解，发前人之所未见；而《盛唐诗》在论述初唐诗与盛唐诗关系的基础上，将盛唐诗人分成“京城诗人”和“非京城诗人”两大系统，并且论述了由于世界观、语言风格的变化导致的不同于初期的盛唐诗风。这两本书在讨论中国古代诗歌时虽不时显露出西方理论的背景，但基本上采取了历史叙述的方法，以“了解之同情”为基本立场，对初、盛唐时期的诗坛总貌，诗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诗歌发展线索等方面做了历史性的描述和分析，力图再现那段诗歌历史风貌，并提出论者的观点和认识。2006年，宇文所安出版了他唐诗研究的第三部著作：《晚唐诗：九世纪中期的中国诗歌（827—860）》（*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2006）。在这部书中，宇文所安承接《初唐诗》与《盛唐诗》，继续讲述晚唐时代的诗歌。通过聚焦于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这三位诗人，宇文氏分析了在盛唐与中唐的主要诗人过世之后晚唐诗人诗歌发生的转变以及对他们诗风的抵制。

正是在写作《初唐诗》和《盛唐诗》的过程中，宇文所安发现了历史叙述方法对研究问题的局限，试图另辟蹊径，转换角度，在一个基于历史而又跨越历史的批评空间内，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和关系，如阅读传统和语境，诗歌的再现与非虚构，诗歌的动机、主题、思想等诸多内容放在一个大的语境当中进行跨时空的对比和讨论。这就是他研究中国诗歌与诗学的代表著作《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1985）。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采用了西方浪漫主义的辩证法对话方式，在

叙述中虚设一个与叙述主体相对立的对话者，让不同的观点充分展示出来。通过这种不同的声音和对话系统使得写作方式更加灵活，因而也就没有一个连贯的、权威的声音作为主导，引导对话向着一个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

宇文所安的另一本论著《追忆》是作者基于个人感受而对中国古典诗文所作的印象式批评。面对读者熟悉的古典诗文文本，宇文氏运用其擅长的文本细读、丰富的想象及精彩的论证，为读者描述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古人面对过去所产生的一种特定的创作和欣赏心理——追忆。“作为一个含蕴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行为，追忆不仅是对往事与历史的复现与慨叹，也寄寓着儒家知识分子追求‘不朽’的‘本体论’的焦虑；更体现了‘向后看’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和思维模式。”^①

1992年，宇文所安出版了集12年心力精心完成的巨著《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这本著作是他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理论期间亲自编选、翻译和评注的中国诗学经典读本。该书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教程，是专为美国大学文科研究生全面学习中国文论而选编的一个读本，也是迄今为止西方汉学领域有关中国文论最为集中的一本著作。本书的研究对象包括早期先秦文本、《诗大序》、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欧阳修《六一诗话》、严羽《沧浪诗话》、通俗诗学、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与《诗绎》、

^① （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封底”。

叶燮《原诗》共 11 章，论述的方式采用一段原文（中文），一段译文（英文），然后是对该段文字逐字逐句的解说和对相关问题的评论。这是一部集中国历代主要文论的英译、注释并评述的中英文对照本，同时也是西方汉学界为数不多的几部全面涉及中国文论并对其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研究的著作之一。全书从文本细读出发，突破了中西文论体系，在对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双向阐释中产生一种互动，从他者的角度对中国文论进行深层的理解、阐释与建构。

宇文所安在 1996 年出版了《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1996）。此书由 7 篇既互相独立又彼此联系的论文组成，分别探讨了中唐时期诗坛上的种种现象，如好奇与守成、山水诗的新变、对琐细的个人生活情趣的表现等；此外还讨论了当时人们的诗歌观念、对作诗的看法以及传奇小说的发展变化等。这本书意在说明中唐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所以不仅通过比较、尤其是和初盛唐的比较来凸现新的因素，而且联系后世以说明它的开创作用。该书也是宇文所安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一种尝试：不仅要摆脱历史框架的限制，而且要摆脱不同文体分野的限制；一方面在横切面上注意各种倾向、各种文体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在纵断面上表现出不同时代文学发展的不同特色和生成关系。

同一年，宇文教授另一本重要的著作《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 1911 年》由诺顿出版公司出版。这本著作整整花费了他三年的时间，是近年来西方汉学界在中国文学和文论研究领域里